

1906—1986

庆祝暨南大学建校八十周年

经济学院论文选集

第一分册

经济学 国际经济



1986·9·广州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论文选集

第一分册

经 济 学

国际经济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编

前 言

为了庆祝暨南大学建校八十周年，检阅科研成果，促进学术交流，我们编印了这套《暨南大学经济学院论文选集》。

暨南大学历史悠久，八十年来为国家培养了不少出色的人才。这是与教师们的努力分不开的，他们在学术领域内也做出了许多成绩。反映在这套《暨南大学经济学院论文选集》中的论文，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选入这套《暨南大学经济学院论文选集》中的文章主要是一九七八年暨大复办以来的科研成果，一般都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过，有一定的学术影响。本《选集》由经济学院所属各系选编，论文作者是现任的教师和科研人员。为了反映研究生的学习成绩和科研成果，还单独选编一册，收录了几年来我校研究生发表的部分论文。

本册为《暨南大学经济学院论文选集》第一分册，由经济学系科学论文选集编选组负责选编，责任编辑李鸿昌。

我们希望校友和专家学者们对我们收集的论文提出宝贵的意见。

庆祝暨南大学建校八十周年

科学论文选集编委会

一九八六年九月

第一分册：经 济 学

国 际 经 济

第二分册：计划统计学

会 计 学

第三分册：金 融

第四分册：企 业 管 理

商 学

目 录

经济学

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	蔡馥生 (1)
论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性质	蔡馥生 (7)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的建立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	张志英 (11)
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王碧华 王富初 (16)
略谈社会总资本运动的货币流通规律	王光振 (20) ✓
对货币流通量规律修正的理解	方大左 (25)
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与绝对地租	周治平 (28)
关于第二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我见	肖步才 (34)
论城市土地有偿使用	周治平 (39)
土地使用费的本质是绝对地租	董 明 刘少波 (45)
生产资料所有制与经济体制改革	陈国泰 (49) ✓
我国价格体制改革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周运源 (56)
关于大城市鲜活农副产品购销体制的改革	官希浩 (58)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住房有计划商品化	罗龙昌 (62)
试论经济法制系统工程	王 河 (66)
投资就业弹性问题探讨	张炳中 (72)
对外开放与经济法制	王 河 (81)
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历史和今后发展战略的浅见	陈锡润 (91)
论当前珠江三角洲乡镇工业发展对策	林厚英 (99)
试析珠江三角洲新会等县农村家庭规模的变化	冯国坚 刘少波 (105)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性质及其发展趋向	陈欽凤 (112)
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	吕长征 (117)
略论马克思人口理论的两大特点	肖步才 (126)
关于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的涵义	史国藩 (132)
评卢森贝对《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评价	肖 凡 (137)
柏拉图是“第一个共产主义理论家”吗?	肖 凡 (141)
提高利用外资效果才能吸引更多外资	李鸿昌 (144)
深圳特区农业发展几个问题的再认识	官希浩 (147)
深圳市搞活物资流通情况的调查	李少卿 郭予亮* (152)

必须加强特区法制宣传教育.....余劲云(156)

*郭予亮同志工作单位:广东省物资总公司

国际经济

论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的特点与我国对外经贸发展策略.....钟远藩(160)

日、美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的比较研究.....钟远藩(166)

探讨资本主义计划化.....王绍西(175)

国际分工问题浅论.....李金亮(183)

战后跨国公司迅速发展原因的探索.....任廷祚 王光振(190)

美国与战后世界市场.....陈欽龙(196)

里根经济计划述评.....李金亮(201)

西欧——帝国主义经济三中心之一.....王绍西(209)

最大优势是实行自由放任政策的自由港.....李鸿昌(216)

香港经济国际性的成因是复杂的.....邓桂林(218)

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和我国社会主义 经济的实践

蔡馥生

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是从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细胞的商品和由商品交换产生出来的货币开始的。马克思认为学习政治经济学的难处在于商品，而不在于货币。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便对读者说明：“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所以本书第一章，特别是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难理解的。其中对价值实体和价值量的分析，我已经尽可能地做到通俗易懂。以货币形式为其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然而，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在这方面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而对更有内容和更复杂的形式分析，却至少已接近于成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页）在写《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关于货币问题的时候，马克思一开头就引用英国国会议员格莱斯顿的话说：“受恋爱愚弄的人，甚至还没有因钻研货币本质而受愚弄的人多。”但马克思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只要理解了货币的根源在于商品本身，货币分析上的主要困难就克服了。在这个前提下，问题只在于清楚地理解货币所固有的形式规定性，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困难的，因为一切资产阶级关系都镀上了金和银，表现为货币关系，因而货币形式似乎具有一种无限复杂的、对它本身说来是外来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4页）

如何弄清楚货币固有的形式规定性呢？这就很有必要回顾一下货币的发展史。货币的发展史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即实物货币、金属货币、信用货币和纸币这四种形式。

实物货币。实物货币在原始社会的野蛮时代就有了萌芽。到了文明时代，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产品种类逐渐增多，实物货币有了发展，但各国各民族的实物货币的形式不尽相同。在各国历史上，最早充当货币的大多是牲畜、兽皮、谷物、布帛等物资。我国也不例外，我国古代也曾用过牲畜、兽皮、谷物、布帛以及作为装饰品的贝壳来充当货币。但以实物作为货币，其中有的容易霉烂，如谷物，不能久藏；有的不能分割，如牲畜，一分割就失去它的使用价值。这样，在长期的交换过程中，实物货币便让位于金属货币。金属货币既不易霉烂，也可分成若干小块。

金属货币。金属货币在我国该是从仿造铜贝开始的。到了商朝和周朝时代，主要金属货币有布币、刀币、圉币。布币亦称铲币，流通于韩、赵、魏等国，即现在的山西、河南、河北一带。刀币也是一种生产工具，流通于山东半岛，后流入于河南、河北等地。圉钱，圆体方孔或圆孔，流通于周秦，即现在的陕西、四川。在楚国即现在的湖北省，有爰金和蚁鼻钱。这些金属货币虽具有实物货币所缺乏的优点，但在交换过程中也暴露出它们

的缺点，如价值小而体积大，不便携带搬运，会氧化生锈。这样，随着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铜铁等贱金属货币便让位于贵金属的金和银。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金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45页）在西欧，贵金属货币的金和银的广泛流通，是在十五世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在我国文史资料中，历代帝王都有用黄金来赏赐大臣的记载，但我们从未见过我国的金铸币。银币也是长期作为银块元宝来流通使用的。鸦片战争后，才从国外流入大量银元。到1889年开始在广东开设造币厂自铸银元，湖北、天津继之，银元才通行全国。

信用货币。货币虽天然地是金银，但金银是矿产，而且产量都不高。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要它们担负起千万种商品交换的媒介，显然是难以胜任的。这样，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便出现了银行券、支票、汇票等信用货币来弥补金银这两种贵金属货币的不足。信用货币是代替贵金属货币充当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的一种信用证券。它直接是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中产生出来的。在资本主义国家，最早的银行券出现于十七世纪。当时银行券的发行是由商业票据所引起的。商品经济越发达，越需要大量金属货币来充当流通手段。金属货币不足，携带也不方便，银行便发行银行券、支票、汇票等来为商品经济的顺利发展服务。商品交换增加，信用货币就增加，商品交换减少或结算时，这些信用货币便流回到银行。流通的银行券的数量是按交易需要来调节的，并且每一张多余的银行券都立即回到它的发行者那里去。银行券这样，支票和汇票也是这样。但是发行银行券需要有发行准备金或叫兑换准备金，其中一部分就是金币或银币以备持票人来兑现之用。在资本主义上升的时候，银行为适应工商业的需要，扩张信用业务，以分取从工人阶级榨取来的剩余价值。但是资本主义的痼疾——经济危机一到来，挤兑风潮爆发，工商业贷款收不回来，大批银行便随着工商企业的倒闭而倒闭。这是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我国的信用货币早在唐代就出现，当时各地商人从远道到京师，把货物出卖后，要把货款带回去，既繁重又风险。商人便把货款交给本道的进奏院（即当时各道驻京办事处），进奏院发给商人一张票券，叫文牒或叫公据。商人回到本道便拿这张票券向本道衙门取款。

纸币。纸币和信用货币虽然本身都是一张纸，没有什么价值，只是载明若干货币单位代表金属货币来执行货币的职能，但它们之间有很大的差别。首先，纸币是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中产生出来的，而信用货币则是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中产生出来的；其次，纸币是靠国家权力强制发行和流通使用，信用货币则全靠银行信用来发行和流通使用；再次，纸币是不兑换现金的，它的发行可不受限制，而信用货币则是要兑换现金的，它的发行要交纳发行准备金，发行数量是受限制的。纸币是价值符号，从表面看，它好象是直接代表商品价值的符号，实际上不是这样，马克思说：“表面上看来，价值符号直接代表商品的价值，它不表现为金的符号，而表现为在价格上只表示出来、在商品中才实际存在的交换价值的符号。但是，这个表面现象是错误的。价值符号直接地只是价格的符号，因而是金的符号，它间接地才是商品价值的符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05页）

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银行券、支票、汇票等信用货币就很盛行。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由于参战国家军费大量增加，国家财政预算出现赤字，这些赤字在战争时期不断增大，它只能用增发银行券来弥补，因此造成通货膨胀。这种大

量增加的银行券，如让持票人向银行兑换金币或银币，势必爆发挤兑风潮，发行银行是无法应付的。因此，各参战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相继宣布银行券停止兑换现金。这样，兑换的银行券一变而为不兑换的银行券，成为国家强制发行的纸币。这种国家强制发行的纸币，任何人都必须接受，不能拒绝。所以，强制通行的国家信用货币是价值符号的完全形式。由于凭国家权力可以“点纸成金”，古代有的国家虽然工商业还不十分发达，信用货币还不盛行，统治者为了要汲取民脂民膏以满足其骄奢淫逸的糜烂生活，也发行纸币。马克思说：“在信用完全没有发展的国家，如中国，早就有了强制通用的纸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07—108页）西汉白鹿皮币是我国最早的纸币。宋代的交子也是一种纸币。它分官交子和私交子两种。官交子是分界发行，即每三年换一次，实际是长期不换。这些纸币因为并不是在工商业发达的社会从商品交换产生出来的，不为人民群众所公认接受，因而不能继续发展。

我国社会主义的货币——人民币，亦是一种由国家统一发行和管理的纸币。但我国的人民币既不同于封建帝王用来汲取民脂民膏的纸币，和资本主义国家当前普遍使用的不兑换的纸币也有本质的区别。

第一，资本主义国家的纸币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它是被资产阶级利用来剥削劳动人民的工具，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我国的人民币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因而它不能作为资本，不能被利用来剥削劳动人民，而是被利用来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人民生活服务的。

第二，资本主义国家的纸币是从弥补财政赤字产生出来的，它既没有兑换准备金，也没有物资做保证。这种弥补预算赤字的财政发行必然造成通货膨胀。我国的人民币，有充足的物资作保证，保证人民币的持有者能从市场上买到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

第三，资本主义国家的纸币是带有侵略性的。在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用货币作武器，实行货币贬值，以争夺国际市场和大量垄断资本输出。我国的人民币是独立自主的货币，它只在国内流通使用，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为人民生活服务。

理解了货币发展的过程和我国人民币的性质以后，我们再来研究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的实践。

马克思在论述货币发展过程时就说明他所论及的只是金属货币，而且是以金作为货币商品。他说：“我们所谈的只是以商品交换直接产生出来的那些货币形式，而不是属于生产过程较高阶段的那些货币形式，如信用货币。为简化起见，到处把金作为货币商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4页）马克思虽然说明他所论述的只是金属货币，但在阐述货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这两种主要职能之后，却明确指出纸币的流通规律和金属货币流通规律的差别。他说：“在价值符号的流通中，实际货币流通的一切规律都反着表现出来了，颠倒过来了。金因为有价值才流通，而纸票却因为流通才有价值。已知商品的交换价值，流通的金量决定于金的自己的价值，而纸票的价值却决定于流通的纸票数量。流通的金量随着商品价格涨跌而增减，而商品的价格却似乎是随着流通中纸票数量的变动而涨跌。商品流通只能吸收一定量的金铸币，因而流通的货币量交替地紧缩和扩张是必然规律，而纸票却似乎不论增加多少都可以进入流通。国家发行的铸币哪怕只少于名义含量

1%克冷，就是减低了金银铸币的成色，因而破坏它们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而国家发行只具有铸币名称而不包含任何金属的无价值的纸票，却是执行了完全正确的措施。金铸币显然只有在商品价值本身用金计算或表现为价格的时候才代表商品价值，而价值符号却似乎直接代表商品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11—112页）

理解马克思所指出的纸币流通规律，对于我们制订社会主义金融政策，指导社会主义金融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在货币流通和价值的关系上。马克思指出，金属货币因其本身有价值，所以才能流通，而纸币则必须能流通才有价值，才能做价值的符号。在旧中国，长期来是以银两为计价和记帐单位的，1933年4月国民党政府才正式宣布废两改元，以银元为计价和记帐单位。1935年11月4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实行所谓法币制度，以中央、中国、交通、农民等四家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为法定货币。法币规定以白银为发行准备金，却不能兑换银元。据1935年10月统计，除中、中、交、农四家银行外，全国还有三十多家私营银行也发行银行券。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统治区，仅山东一省就发行了九十种纸币。1935年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预算赤字就达8.2亿元。1937年到1945年财政预算赤字逐年增加，伪法币发行量增加了390多倍，1945年到1948年8月这三年间，伪法币发行量增加了一千多倍，远远超过抗战八年的增长速度。1948年8月20日蒋介石为欺骗人民，又发行了所谓金元券，一出笼就被人民拒绝。同时，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下，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美国、比利时、荷兰等帝国主义国家均在中国设立银行，发行钞票在市面流通使用。由于国民党政府国家银行所发行的钞票在抗战时期，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币值一落千丈，人民群众蒙受极大损失，对伪法币失去信仰，帝国主义国家的货币便乘机大量侵入，在国民党统治区广泛流通，到1949年中国大陆解放前夕，据估计，仅美国的美元在中国的流通额就达十二亿元。香港汇丰银行、麦加利和有利三家银行所发行的港币在中国的流通额亦达十七亿多港元。在旧中国金融市场十分混乱的情况下，要使人民币能为全国人民所接受，占领全国金融市场，是一件很艰巨的工作。为达到这个目的，新中国建立后我国采取了下列政策和措施：

（一），肃清伪法币、伪金元券、伪银元券。在有利于打击敌人，有利于保护人民利益，有利于稳定市场，保证人民生活等原则下，采取实事求是的有效措施，逐步肃清解放区内伪法币、伪金元券、银元券，使人民币占领全国金融阵地。

（二），驱逐外币，特别是港币。几十亿的外币在我国内流通，说明帝国主义者曾从我国掠夺价值几十亿外币的物资，在全国大陆全部解放前后，即在华南地区展开了驱逐外币运动，向人民群众宣传，按规定牌价收兑，把外币集中起来投向海外把物资抢回来，同时禁止外币在市场流通使用。

（三），禁止金银在市场上流通使用。金银都是一种商品货币，它们都是最好的货币素材。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它们在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方面，起了极大的作用，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这两种商品货币如果没有信用货币的协助就无法更成货币的职能。我国的金银产量很低，不能胜任货币的流通手段自不必说，但如让它们留在金融市场流通，那就会妨碍人民币的流通。因此，政府一方面按牌价把金银收兑集中到银行来，以便加强人民币这一统一的金融市场的管理，另一方面可把金银作为世界

货币使用，进口我国所需要的物资。

经过采取上述这些措施，我国的人民币在建国前后很短时间内便占领全国金融市场，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胜任地执行了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等货币职能。

第二，在货币价值与货币流通量的关系上。马克思指出，在金属货币制度下，货币的价值决定着货币的流通量，金的价值高，货币的流通量就可少些，反之，货币的流通量就要多些。在纸币制度下则相反，纸币的流通量决定纸币的价值。纸币的流通量增加，纸币的价值就下跌，反之，则纸币的价值就上涨或稳定。怎样控制人民币的发行量，使它能和市场需要量相适应，这也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我国人民币在建国初期是采取经济发行的方针。经济发行就是根据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通过增加工商业信贷来发行，故也称信贷发行。这种经济发行能控制货币发行量，因为工农业产品增加，银行就贷款给商业部门进行收购，这种发行就有物资的保证；而商业部门把商品卖出去，又把货币收回，还清银行贷款，人民币就不停留在市场上。至于财政发行，是资本主义国家经常用来弥补赤字的办法，它包括财政部门向银行透支，或企业把银行贷款用于上交利润税款等财政性开支。这种发行是没有物资保证的，所以，必然造成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对国计民生都很不利，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应采用的。

第三，在商品价格和货币流通量的关系上。马克思指出：在金属货币制度下，商品价格的涨落决定于金属货币流通量的增减，商品价格高，货币的流通量就要增加。反之，就会减少。在纸币制度下则相反，纸币的流通量的增减决定商品价格的涨落，流通量增加，商品价格就上涨，货币流通量减少或不变，商品的价格就下跌或稳定。为了保障人民生活 and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我国除坚持经济发行的方针外，同时对国计民生有密切关系的物资，实行计划价格。这样便使人民币持有者买到生活需要的物资，使我国人民币成为世界上最稳定的货币。

第四，在市场需要量和货币流通量的关系上。马克思指出：在金属货币制度下，如果货币流通量超过市场的需要量，超过的金属货币就会自动紧缩退出流通界，在纸币制度下，则不管投放多少纸币，流通领域都可以容纳。依照纸币这一流通规律，为了防止过多货币冲击市场，管好货币流通，我国在1950年的抗美援朝时期，就开始实行现金管理制度。规定党政机关、团体、企业，现金只留三天零用钱，其余必须存入银行。这样便把全国的货币管理起来了，不让它冲进市场兴波作浪。另一方面开展爱国储蓄运动，把城乡闲散资金收集起来以供应工商企业流动资金的需要。这样便保证了抗美援朝时期国民经济继续发展和取得抗美援朝的最后胜利。

从“二五”时期开始，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加上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和苏联的背信弃义，撕毁协定，使我国经济遭到极大的困难。国家财政预算出现赤字，只能靠财政发行，增发钞票来弥补，造成社会主义国家不应有的通货膨胀。经过贯彻执行党和政府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形势有所好转。但十年动乱，生产力受到更大的破坏，国家财政预算长期出现赤字，均采用财政发行的办法来弥补。粉碎“四人帮”后，由于基本建设的战线拉得太长，1979年国家财政预算仍出现了赤字，虽经发行国库券来弥补，但国家财政预算的赤字未能完全消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后，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纠正了重

积累、轻消费，重重工业、轻农业和轻工业的偏差，积累率已从1978年的36.5%，调到1982年的29%，消费基金有了较大的增长。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所占比重已由1978年的27.8%提高到1982年的33.6%，轻工业所占比重由31.1%提高到33.4%。这些说明三中全会提出的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我国国民经济已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在这大好形势下，我国金融工作应该怎样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经济建设服务呢？我认为：

第一，禁止使用外币，让人民币完全统一占领全国的金融市场。大量外币存留在我国市场，说明大量的物资外流。解放前这样，解放后的今天也是这样。因此，我们不能容忍解放前港币充斥市场现象的重演。采取什么办法呢？近年来有发行特区货币的呼声，这当然是一种可考虑的办法。但当前情况和三十多年的情况大不相同，我们必须从出口商品价格、外汇价格、特区本身经济力量，特区和港澳关系等方面来考虑，想出一个妥善的办法。

第二，要坚持经济发行方针以保证流通中的货币量与商品流通量相适应。由于“二五”以来没有坚持经济发行这一方针，搞了不少财政发行，在当前人民币流通量超过商品流通量，国家财政预算赤字还未能完全消灭的情况下，必须坚持经济发行这一方针，不能再搞任何方式的财政发行。

第三，要贯彻执行对外开放政策，通过补偿贸易、来料加工装配、与外资合作经营等方式，尽量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对中小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打好工农业生产技术基础，提高劳动生产力，大力发展生产、改变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增加出口商品数量，以争取更多的外汇来为四个现代化经济建设服务。

原载《学术研究》1983年第五期

（上接第10页）

第三，使我们明确认清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及其重要性，总结三十年来计划管理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制订出适合我国实际的经济管理体制，更有效地搞好计划管理工作，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经济建设。考虑到我国是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允许个体经济存在，农贸市场还相当普遍地存在，在计划工作上，就必须坚持计划管理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

原载《学术研究》1983年第三期

论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性质

蔡馥生

近几年来，经济学界在探讨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时，很自然地论及到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性质和基本特征等问题。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它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对此，现有种种的提法：有的说是有商品关系的计划经济，这种经济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商品计划经济，第二阶段是产品计划经济；有的说，是发达的商品经济；有的说，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还有的说，是计划经济，但只承认商品经济而不提产品经济。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第六条规定：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第十一条规定：“在法律的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只肯定了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结构，没有谈社会主义经济性质问题。为要弄清楚这一问题，我觉得有必要回顾一下人类社会发史展的历程。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根据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结合方式，把过去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即初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等五种社会制度，也就是人类已经走过的行程。经济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它指的是社会物质资料生产及与生产相适应的交换和分配，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恩格斯说过：

“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没有交换，生产也能进行；没有生产，交换——正因为它一开始就是产品的交换——便不能发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86页）

人类的物质生产从它的生产目的来看，可以划分为产品生产和商品生产。什么是产品，什么是商品，马克思早就把它们划分清楚。他说：“如果一个人生产一个物品是为了满足自己直接需要，是为了供给自己的消费，那他所创造的就是产品，而不是商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78页）。在《资本论》中又说：“一个物可以有使用价值，而且是人类劳动产品，但不是商品。要生产商品，他不但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为了避免读者误解，恩格斯加上一段插话说：“而且不只是单纯为别人。中世纪农民为封建主生产交代役租的粮食，为神父生产纳什一税的粮食。但不管是交代役租的粮食，还是纳什一税的粮食，都并不因为是为别人生产的，就成为商品。要成为商品，产品必须通过交换，转到每它当作使用价值使用的人的手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4页）。根据马克思的恩格斯的提示，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来看，我们对产品生产和商品生产，可作如下的表述。即凡是为满足自己身家或社会集体需要的生产就是产品生产；凡不是为满足自己身家而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要通过货币进行交换以满足别人和社会需要的生产就是商品生产。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方式，构成了产品经济；商品的生产和商品交换，以及价值的分配方式构成了商品经济。人类要生存，必

须用自己的劳动从事食物、衣服、住房等生活资料和劳动工具的生产。因此，产品生产是同人类生存共长久的。至于商品生产，它是一个历史的经济范畴。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明确指出，文明时代是从商品生产开始的。他说：“文明时代所由以开始的商品生产阶段，在经济上有下列特征：（1）出现了金属货币，从而出现了货币资本、利息和高利贷；（2）出现了作为生产者之间的中介阶级的商人；（3）出现了土地私有制和抵押制；（4）出现了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的奴隶劳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2页）。商品生产这一历史的经济范畴和其他历史事物一样，有它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它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的。有私有制才有商品生产，私有制消灭了，商品生产也就没有了。

然而产品生产是怎样变为商品生产？产品生产和商品生产怎样辩证地发展呢？要说清这个问题，还得从原始社会开始。

原始社会分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在蒙昧时代，人类的食物是以采寻现成的自然产物为主来维持生活的。在低级阶段，人们只能以果实、坚果、根茎为食物；到了中级阶段，人类从以鱼为食物和使用火开始；到了高级阶段，有弓箭，人们就会打猎，增加以兽肉为食物。可见，在蒙昧时代，人类还没有懂得驯养动物和种植植物来供给自己食用，而是全靠现成的自然产物来维持生活。这种生活是名副其实的自然经济。到了野蛮时期，人类才学会经营畜牧业和农业，即学会靠自己两手劳动来增加维持生活的产品。在低级阶段，人们学会制陶术，日用品增多，渔猎品也容易供水用。在中级阶段，东大陆是开始驯养家畜，西大陆懂得用灌溉栽培食用植物，并开始用干砖和石头来建筑房屋。由于畜牧业和农业的发展，便出现了第一次的社会大分工，畜牧部落从农业部落分离出来。到高级阶段，铁矿的冶炼开始了，这个时期的生产工具有铁斧、铁锹、铁犁，使大规模耕种成为可能。由于产品的迅速增加，织布业，金属加工业、手工业等生产技术有了进步。农业除提供谷物、豆类 and 水果外，还提供了植物油和葡萄酒，这样便发生了第二次的社会大分工，手工业又从农业分离出来。由于产物种类和产量的增多，交换逐渐成为社会的迫切需要。到了文明时代，对前两次社会大分工有所加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均有所发展，这样便产生了第三次的社会大分工，出现了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交换的商人。这样，原始社会便进入了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所谓文明时代。由此可以想象得到，在原始社会的野蛮时期，人类虽然懂得耕种和畜牧，末期还有金属生产工具，但生产力还是很低的，生产活动全靠集体的力量，共同生产，共同消费，因此，被称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社会的生产，都是为满足集体需要而生产的。

文明时代包括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这三种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制度。奴隶社会，奴隶是被奴隶主当做能说话的工具来使用的。奴隶们所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主要是用来满足奴隶主的需要，多余的产品，奴隶主才把它作为商品卖出去以换回自己所需要的物品。在封建社会，商品生产也不发达，农民或农奴男耕女织，他们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一部分供自己和家属的消费以及维持其简单再生产，一部分作为实物地租交给地主，有多余的才拿到市场去换回自己生活上和生产上所需要的物资。地主也是这样，从农民剥剥来的地租，以一部分用来供应自己和家属及婢仆的消费，剩下的便作为商品拿到市场去换回自己需要的物资。可见奴隶社会也好，封建社会也好，社会生产力

还很低，商品生产还处在幼年时期，是简单的商品生产，它的流通公式是商品——货币——商品，是为买而卖。因此，占社会经济统治地位的不是商品经济而是传统所称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实际上就是产品经济。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发达并应用于生产上，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商品生产达到最高峰，即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简单商品生产不同，它的流通公式是货币——商品——货币，是为卖而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上的一切，包括劳动力都成为商品，都可以用货币买到。这样，商品生产便在社会经济上占统治的地位而给产品生产以否定。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必将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然而根据马克思的估计，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将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这个国家由于资本主义大企业都改为国营企业，产品生产必将蓬勃发展，而商品生产必然走向灭亡。到那时，产品生产便给商品生产来一个否定的否定，使人类社会进入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种趋势，如列宁所说，在理论上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历史的发展超出马克思的预测，无产阶级革命不是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而是在资本主义比较不发达的俄国发生并取得胜利，在世界上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苏联。更出乎预料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搬掉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再通过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基本上结束了旧中国的一切私有制，建立起两种生产资料公有制，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改变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这种新的情况，对产品生产和商品生产，便提出了新的课题。

人类社会按照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结合的方式划分为五种社会制度，仅就生产资料所有制来说，人类社会可划分两种社会制度，即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和商品生产结伴起步的，它经过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登上了商品生产发展的最高峰，同时也是私有制发展的最高峰。商品生产是为别人或社会需要而生产的，因之，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必然是社会化的大生产。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里，客观上就存在着一条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经济规律。按照这条规律办事，国民经济就会顺利发展，不按照这条经济规律办事，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就会失调，造成社会经济的浪费和损失。但是，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它存在着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这一基本矛盾使它不可能按照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经济规律办事，实行计划经济。相反，这一基本矛盾使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陷入无政府状态，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不治之症。因此，资本主义经济性质，可说是无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它没有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基本矛盾，有条件按照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规律办事，实行一个接一个的经济计划。因此，对比着资本主义的无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的经济性质应该是有计划经济。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在国民经济的各个环节中，也和资本主义有根本的不同，在生产上，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要通过商品生产，从工人阶级身上剥取尽可能高的剩余价值。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根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逐步满足全社会成员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在交换上，资本主义的市场是任凭价值规律去摆布，吃亏的是劳动人民。社会主义则利用价值规律，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产品，实行计划价格以保护人民生活。在分配上，它否定了资本主义的按资分配，实行按劳分配，直到产品十分丰富的高级

社会再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

谈到这里，有人会问：我国既然是社会主义的社会，应该大力发展产品生产，为什么还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呢？问题是：第一，我国的社会主义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建立起来的，劳动生产力很低。建国三十多年，经全国人民的努力，国民经济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比起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远远落后。照世界银行统计，按人口平均国民生产总值，西德为11,730美元，美国为10,630美元，法国为9,650美元，日本为8,810美元，英国为6,320美元，而我国只有260美元。农副产品的商品率也很低。农民直接卖给国家的农副产品的价值，占当年农业净值的比重，1957年为41.5%，1979年也只是44.9%。粮食的商品率更低，1979年粮食总征购量，只占总产量20.8%，如扣除反销给农村的数量，则只有14.7%。所以，我们不大力发展商品生产，怎能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怎能满足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第二，我国建立起两种生产资料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否则，就换不到集体公有制更多的粮食和轻工业原料，集体公有制也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否则，就不能从全民所有制换到更多的农业生产资料和日用工业品。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依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社会主义的生产是产品生产。发展商品生产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方向和最后目标。我们今天大力发展它，是为着今后尽速地消灭它。发展商品生产和发展产品生产是不相矛盾，是相辅相成的。比方说，全民所有制在大力发展商品生产的同时，要大力发展国营农场经济的产品生产，逐步争取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的自给自足；集体公有制也是这样，在大力发展商品生产的同时，要大力发展社队工业企业的产品生产，逐步争取农业生产资料和日用工业品的自给自足。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协作和联合体组织的发展，两种生产资料公有制将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转化为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从而进入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也许有人会说，产品生产是将来高级共产主义社会的事，现在根本谈不到。这是错误的。我们且不说国营工业产品本质上都是产品生产，单就我国的机械工业部门来说，有的就是管国防工业的，他们的产品能说是商品吗？在农业方面，粮食的三分之二以上是农村集体公有制自己消费掉，其他经济作物也有不同比例是集体公有制自己消费，这些物品的生产难道不是产品生产吗？

由此可见，那些认为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的经济性质是发达的商品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有商品关系的计划经济都是不符合实际，在理论上说不通，实践上是有害的。我认为对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性质可作如下的表述：它是建立在两种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基础上，产品生产和商品生产并存的计划经济。这样的表述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使我们明确社会主义的生产是产品生产，不能再为生产而生产，而是要更好地依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办事，生产出更多品种、更加美好的产品来满足全国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第二，使我们明确商品生产不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今天大力发展它是为了今后尽速地消灭它这一观点，不再片面地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甚至用它来反对指令性的计划管理，能更好地限制和利用价值规律来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下转第6页）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的建立 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

張 志 英

能否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党的历史上曾发生过激烈地争论。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二次革命论”者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只能依靠资产阶级首先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然后在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再由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建立社会主义；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一次革命论者则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经过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结果必然是直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一九四九年新中国的诞生，历史雄辩地说明了前者完全是错误的，后者是无比正确的。

在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废墟上，取得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所取得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具有伟大的世界意义，为中国人民展示了无限美好的前景。建国三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建设尽管受到了“左”倾错误的影响，但在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群众生活改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仍然无可辩驳地证实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三中全会以来，党认真总结了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制定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方针，提出了在二十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蓝图。当前，全国人民正在“十二大”精神指引下，全面而系统地进行改革，大力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力争早日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

抚今忆昔，我们重新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产生的必然性，必能增强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满怀豪情建设我们伟大祖国的未来。那么，怎样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产生的必然性呢？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不应该是教条的，而应该是辩证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来分析旧中国的社会基本矛盾和革命实践，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去阐明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同其他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是由其内部矛盾运动决定的，这是一般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主要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个社会基本矛盾的对立统一运动中发展的。两对矛盾三个方面的相互作用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基本因素，中国革命的胜利，证明了这一原理的科学性。